

鲁 鹏 著

ZHIDU YU FAZHAN

制度与 发展关系 研究

GUANXI YANJIU

人 民 出 版 社

本书为200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最终成果

ZHIDU YU FAZHAN GUANXI YANJIU

制度与 发展关系 研究

鲁鹏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夏 青
装帧设计:曹 春
版式设计:顾杰珍
责任校对:智福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制度与发展关系研究/鲁鹏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

ISBN 7-01-003603-9

I. 制… II. 鲁… III. 制度-关系-社会发展-研究 IV. K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5580 号

制度与发展关系研究

ZHIDU YU FAZHAN GUANXI YANJIU

鲁 鹏 著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2 年 3 月第 1 版 2002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10.5

字数:249 千字 印数:1—4000 册

ISBN 7-01-003603-9/B·303 定价:18.80 元

序

将制度与发展联系起来加以探讨,据我所知,经济学家早已为之。先是凡勃伦、康芒斯等人把制度作为重要因素引入经济分析中,创立起经济学理论的制度学派;后有科斯、诺思等人将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运用于制度分析中而对当代发展作出解释的努力;晚近十几年间,国内一批中青年学者也给予制度以极大关注。经济学家们关心经济发展,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意识到经济发展绝非仅仅经济本身的事情,而如果我们把经济发展看做社会发展的一个部分,将发展从狭义的经济增长中解脱出来而与社会发展等同,那么在经济增长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制度在社会发展中又会怎样?这样一个更具一般意义的制度与发展关系问题,我想,至少是哲学应当反思的对象。

中国哲学界关注社会发展已十年有余,综观既往研究,有两种偏向值得注意。一种是过分强调发展研究的形而上学性质,以至于使研究的内容游离了当代发展实际,从而显得不着边际,空洞玄虚。一种则走向另一个极端,就是过分注重实证层面的分析,甚至沦为纯粹的对策性方案,从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流于支离。如何有效地克服这两种偏向,乃是当前发展研究能否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关键。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首先需要找到恰当的切入点,进而需要给出合理的解释。《制度与发展关系研究》一书应当说在这两方面都作出了具有开拓性和创新意

义的探索。

我们知道,制度是当前发展研究的热点。人们所以关注制度,与其说出自理论的呼唤,不如说出自发展实践的“自然”。在此之前,我们虽然对制度这一概念本身并不陌生,对它的理论意义、角色和功能却所知甚少,只是伴随改革的不断深化,面对着深层结构和深层矛盾问题,我们才自觉到制度创新的重要。改革进入“深水区”后制度的重要性方凸显出来,这一现象本身即值得思考。从制度角度研究发展,涉及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组织行为学、行政管理学等多学科、多领域的众多问题,具有边缘性、交叉性的显明特征。社会转型时期的特点之一,是已有的理论受到冲击,新的理论亟待建立。这是一个理论面临实践挑战的时期,也是理论创新的大好时期。当代学术表明,新的理论最容易在边缘交叉地带生成。因此,从制度角度研究发展,有可能是一个有着广阔思考空间和拓展余地的理论生长点和突破口。

事实上,鲁鹏在《制度与发展关系研究》一书中确实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这些观点涉及社会性或社会关系理论、人学理论、自由理论、社会结构理论,蕴含着马克思的实践思想、主体性思想,在论文答辩和其后他所发表的一些论文中得到许多专家好评。关于这些,读者们在读过该书后自有判断。就我本人而言,我未必同意书中的所有观点,但我赞赏作者不畏困难、大胆探索的精神,因为在尊重既有理论、尊重发展实践前提下的大胆探索精神是当前迫切需要的;我更期待着读者对该书的批评,因为只有在学术争鸣中理论才会得到健康发展。

鲁鹏认为制度是发展由可能到现实的中介,我想,从制度的角度研究社会发展其启示价值本身也将是中介性的。这就是:一方面它有助于对发展研究的形而上学追问;另一方面它有利于操作

层面研究的深入和拓展。在这两个方面,制度与发展关系的研究都不乏建设性的意义。

李 敏

2001 年 7 月 13 日于中国人民大学林园

责任编辑 夏 青
封面设计 曹 春
版式设计 顾杰珍

目 录

序	前 言 (1)
第 1 章 导 言	(1)
第 2 章 发展的中介	(18)
2.1 活动的结构	(18)
2.2 制度与文化	(31)
2.3 制度与器物	(49)
2.4 改造世界的问题	(72)
第 3 章 发展的调控机制	(83)
3.1 发展及其基本问题	(83)
3.2 交往	(99)
3.3 冲突与合作	(112)
3.4 制度的功能	(124)
3.5 人的本质对象化	(145)
第 4 章 发展的实践反思	(158)
4.1 经济发展	(158)
4.2 科技进步	(175)
4.3 伦理效应	(186)
4.4 社会稳定	(197)
4.5 经济全球化	(222)

4.6 社会活力	(235)
第5章 制度创新	(243)
5.1 制度的局限	(243)
5.2 制度创新的约束条件	(252)
5.3 制度创新的形式	(269)
5.4 中国制度创新的路向	(289)
第6章 文明的运势	(297)
参考文献	(321)
后 记	(326)

导 言

发展的制度分析是思维反思实践的一种角度。其重点不在于说明制度是什么,而在于说明制度与发展的关系,更具体些,说明制度是如何影响发展的,它在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发挥作用的机制以及它与发展相适应的方式。当然,解释制度是什么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如果没有这种解释,制度与发展的关系在论据上会有一些欠缺。

对同一事物可以从不同角度解读。因为角度不同,对同一事物解读出的味道自然不同,也构成了各角度的固有特色。惟其如此,不同角度的解读也便有了自己特定的范围,在这个范围内它是有效的、合理的,超出这个范围,情形就可能大不一样。发展之制度分析的着眼点亦即它的视阈,在于社会组织行为,在于人的社会性。

从制度入手分析发展,探讨制度与发展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固然有理论上的因由,主要还是发展实践使然。

中国改革自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序幕后,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改革在没有现成经验可依、没有既有模式可搬、且对于如何发展的理论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凭借健康的实践理性,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清理了“文化大革命”及其遗留下来的种种错误观点,为发展奠定

了良好的思想基础；与此同时，在解决改革实际存在的问题的过程中，人们把握现代发展的能力逐步提高，对操作方式的选择和运用趋向合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处理在某些方面也较之以前成熟了。无需讳言，中国改革也遭遇许多问题，其中一些问题长期困扰我们，迄今未能有效解决。例如，人民群众普遍关注、中央高层表示不满的“一手硬，一手软”问题；经济学家紧盯不放、各级政府操心备至的国有企业问题；传统悠久、关系重大的行政权力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各个角落渗透泛化问题等等。对于这些问题，可以用许多理由来加以解释，却惟独不能用“不重视”一类的理由予以说明。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颁布了两个，与之媲美的只有经济体制改革，考虑到经济建设是当前社会发展的中心，对精神文明的重视可用“高度”二字来概括；国企问题不解决，经济改革和发展无“勇”可言，逻辑上说不通，与事实也不符合；至于行政权力泛化问题，虽然背景复杂，歧义多多，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却是 50 年代以来就想解决的问题。因此，总体来看，高度重视但尚未找出一种好的办法，是上述问题的共同特征。

由此我们不能不反思：过去取得成功的经验是什么？某些问题不能有效解决的教训是什么？

一个以往理论研究中没有引起人们足够重视——至少没有达到本应当有的程度，甚至在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诸多研究已经指涉到它时，其深层意蕴是何物，人们的认识也未上升到理论思维的自觉——的因素浮现出来，成为人们谈论经济结构调整、思想道德文化建设、公民权益保护和社会调控方式时越来越多提及的话语，这就是制度。

当制度成为公共话语中愈益自觉的对象时，回过头来审视，我们发现，其实中国改革伊始它就存在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改革的目标和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国家，实现现

代化；改革的直接对象是制度；改革就是以建立、健全、完善或创新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等等为手段，来实现或完成社会发展的既定目标和任务。之所以进行改革，因为传统体制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经济改革所以绩效显著，基本原因在于经济体制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一些问题所以长期困扰我们，基本原因则在于与其涉及的深层结构—功能关系相联系的各项制度尚未发生应有的或适当的转变。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与制度创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制度创新的每一举措，都对发展产生着极大影响。

当我们将目光由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拓展开来进一步反思时，我们发现，在历史上，在世界许多国家中，制度同样是与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素。

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经历过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过程。洋务运动以“中体西用”为前提，学习西方的科技、经济，创建发展民族轻工业、矿业和交通运输业，意欲解决器物问题，“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洋务运动在原有的封建官僚制度和体系下从事近代工商建设，经济没有也不可能有效率，国家没有也不可能迅速崛起，结果，中法战争失败的旧辱未去，中日甲午战争失败的新辱又来。看到了旧体制的弊端，改良派一方面继续洋务运动的经济主张，一方面要求维新变法。而慈禧太后对改良运动的剿灭，最终使人们认识到，要想使中国发展、富强，只有推翻清王朝。20世纪是中国社会发展最快的时期，我们由一个愚昧落后挨打受气的国家，一跃成为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初步繁荣昌盛的现代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20世纪也是中国社会制度变革最为巨大频繁的世纪。

在世界历史中，那些曾导致社会发生巨变的事件或运动，无论革命还是改良，无论采取渐进方式还是采取飞跃方式，几乎都以制度变革为直接目标，并且都大大推进了发展。英国“光荣革命”、法

国大革命、美国革命、日本“明治维新”，产生出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社会的巨大发展；俄国“十月革命”产生出社会主义制度，带来社会巨大发展。往前追溯，原始公社解体、奴隶社会产生及其被封建社会所取代，也带来社会巨大发展。不同社会形态中的发展如此，同一社会形态中的发展亦复如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迎来一个长达 50 年的稳定发展时期，这一现象出乎许多人的预料，也引起人们极大的研究兴趣。结果发现，汲取以往经验教训，调整、建构、完善各项社会制度，能使社会保持足够的灵活性、调控能力和活动空间。

古今中西每一次制度变革均围绕一个(或数个)目标进行。这个目标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促成的，是当时社会发展的历史要求。变革后产生的新制度反映或代表这个目标，以它的实现作为自己存在的理由和根据。

资本主义制度在它的发源地(英国)最初并不是要推翻封建统治，而是要使已经滋生蔓延的资本主义经济少受阻碍、顺利发展。托克维尔论及法国大革命时说：“人类生来平等，因此应废除种姓、阶级、职业的一切特权，人民享有主权，社会权力至高无上，统一规章制度……所有这些信条不仅是法国革命的原因，而且简直可以说就是大革命的内容；它们是大革命最基本的业绩，论时间，则是大革命最经久最实在的功绩。”^①“明治维新”的目标十分明确，面对欧美列强的炮舰，只有变革才能富国兴邦。“明治维新”意欲达到的目标也是晚清中国“戊戌变法”的目标。

马克思谈到社会主义革命时说，社会化的生产力和生产资料私有制发生尖锐矛盾，要解放生产力，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与社会化生产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因此社会主义革命的

^①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 1992 年，第 46 页。

首要目标是发展生产力,这种生产力为劳动者自己所控制,与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是经济发展目标和伦理道德社会平等公正目标的双重实现。马克思提出革命的理论,列宁将马克思的理论变为现实,在苏联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的理论是宏观的,列宁作为实际领导人则要将其具体落实,他提出了新经济政策,主张从俄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借鉴学习资本主义社会某些东西,认为只有这样,才会迅速恢复俄国经济,抵御帝国主义势力的干预,巩固社会主义政权。列宁未能做完这件事,苏联在其后的发展中,按照理论的描述,走上了一条以高度集中为体制特征的计划经济发展道路,虽然一度使自己成为世界上惟一能够同美国相抗衡的超级大国,却也埋下了衰弱的种子。应当说,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变为现实并在继承基础上予以创造性发展的是邓小平,他从中国实际出发,对中国社会独特的发展道路作出深刻阐释,形成了当代中国发展的指导思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其中关于改革的目标讲得很清楚,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革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也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历史上一切大的制度变革归根到底都是为了这个目标。《共产党宣言》说:“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① 列宁强调:“马克思主义应该坚决反对那种认为在俄国没有激进的政治变革也可能实现激进的土地变革的观点。”^② 马克思、列宁谈的虽然是社会主义政治统治和政治变革,基本思想却适用于一切制度变革。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3页。

② 《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版,第311页。

发展的每次跃迁都伴随制度变革,制度变革以实现当下迫切需要解决的历史任务为目标,这种现象的普遍存在显然不能用偶然性加以解释,它表明,制度与发展有着某种必然联系。

发展的实质是“做”,不是“想”,因而研究发展的出发点不是“应当”而是“如何”。对于今天世界各国说来,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发展,而在于怎样或如何发展。“应当”是一种理想。对未来理想的东西,可以从两种角度审视。从价值角度审视,理想本身就是价值的表征、价值的向度、价值的追求,具有超越性的特征和精神家园、信仰支撑、心灵抚慰的功能,因而理想提出本身就具有意义。从实践理性角度审视,理想要能实现须有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因此,它必须与现实联系,从现在做起,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有变理想为现实的手段,否则便是“空”的。

以往人们在发展问题上常犯两类错误,一是将价值理想与现实目标相混淆,把不可能的事情当作可能的事情来做;二是将发展目标与发展过程相混淆,把未来才能完成的任务放在现在来做。两类错误有时交织在一起,它们在动机上或许是“善”的,在效果上却无一例外地产生了“恶”。

就一个社会而言,“如何做”的问题主要是如何将不同的人们组织在一起并使之产生最佳整体绩效的问题。“组织”有两种涵义,一是名词上的,二是动词上的。名词涵义上的组织指:“一种主动协作的社会单元,包括两个或多个成员,其功能是在相对连续的基础上实现一个共同目标或一系列共同目标。”^① 社会学对组织的定义与组织行为学大致相似:“精心设计的以达到某种特定目标

① S.P. 罗宾斯:《组织行为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第七版),第 612 页。

的社会群体。”^① 动词涵义上的组织指：“确定从事哪些任务，由谁来干，怎样对任务进行组合，谁向谁汇报以及由谁来制定决策的过程。”^② 本书所说的“组织”取其动词涵义。如何做亦即如何组织的问题，因此可以解读为如何在自然条件和历史基础上调动协调人力、物力、财力和智力资源的问题。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因此可以解读为通过调动协调，努力使人力、物力、财力和智力资源发挥最大效能的过程。不消说，社会不能没有组织，个体行为也不能脱离组织，人类历史的演进过程即是人类生活的自组织过程，它或者通过自觉组织的形式表现出来，或者，如果没有自觉组织，也要通过自发的形式演生出组织。社会发展是有组织的活动过程，乃本书一个基本观点，也是本书进一步分析的重要逻辑基础。

我们对器物极为重视，倾注了大量精力财力，或加大投资力度，更新机器设备，引进高新技术；或学习先进工艺管理，重视科技转化，提高决策水平，但效率不高始终是困扰我们的问题。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钱是买不来一个现代化的。

我们对文化给予极大关注，希冀靠它提高人的素质，净化社会风气，为发展创造条件。80年代中后期，有一场关注发展的大讨论，文化即为该讨论的主题。那时的普遍观点是，现代化建设需要现代化的人。由此逻辑地推演出另一个观点，必须对传统文化加以彻底清算。有人认为，辛亥革命所以失败，因为当时的国人没有自由、民主、理性的素质，认识到这一点，产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今天现代化建设要想成功，也必须进行思想启蒙。毫无疑问，如果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变化，就可以产生人们所期望的结果，中国人的观念也确实发生了变化，但问题在于，在一个传统影响深重的社会

① D. 波普诺：《社会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第十版），第 189 页。

② 同上书，第 612 页。

里,我们怎样才能使人们的观念发生变化?什么原因使人们扬弃传统,产生或接受新观念?

现在是关心制度的时候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从放权让利到现代企业制度,从奖金鼓励到股份制改造,从劳动密集到技术密集,从计划到市场,中国改革的各种措施、各种形式、方方面面所有一切逐渐昭示出一点:生产各要素的变化只有在某种系统机制下,或伴随制度变革,形成协调运行的关联方式,才能产生国民经济整体的良好绩效。

文化固然非常重要,以下三个现象是饶有趣味的:(1)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后,80年代文化热发生在改革决策实施之后。(2)五六十年代曾经有过一种至今还让许多人怀念的文化观念,现在这种文化观念大面积地消退了。(3)由于精神道德领域存在某些消极现象,传统文化不仅没有在批判声中倒下,反倒显得比“批判”更有生命力,有人甚至要使它走向21世纪。这三种现象传达出一个信息,文化运动常常附着于现实运动,它可以起催化作用,但真正改变一种观念或保持一种观念的是现实发生的事情,是这些事情的运作方式和机制。

器物之效率的提高和文化之观念的形塑均指向实践方式。物质生产的方式和思想文化活动的方式常常是同一的,很多时候与其把它们理解为两种不同行为的方式,不如理解为同一行为的同一方式——例如生产方式——更合理。^①马克思对生产方式高度重视,“生产方式”重在“方式”。相对于其他活动而言生产是重要的,相对于生产而言方式是重要的。按照一定方式进行生产,既会

① 人们常常单纯从生产角度理解生产方式,单纯从文化角度理解文化方式,其实生产方式反映了人们对现实的某种理解,表征着某种观念和精神,本身也是一种文化方式,文化方式体现着人们在生产什么、怎样生产时的价值选择和意义指向,本身也是一种生产方式,二者不过是对同一事物的不同说明而已。